

驀然回首，盼見教育研究的社會影響

甄曉蘭*

轉眼間，回國投身教育與研究已二十多年了。一路走來，享受到許多前國科會、現科技部的學術獎補助資源，甚感慶幸，也格外珍惜。無論是早期的學術甲種獎鼓勵、歷來的多年期個別型或整合型計畫補助、或多次的國外短期研究支持，都讓我得以有機會不斷地開展教育探究，增長學術見識、累積研究能量、修煉實務智慧。期間，或欣見學術研究的成長、或悲痛學術評鑑與知識生產的偏差，但總懷抱希望，兢兢業業，企盼教育研究持續精進、再造，帶動學術發展與教育革新。值此《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創刊 20 年之際，針對教育研究發展的觀察與體驗，略抒個人省思心得與發展期許。

善用資源拓展教育學術研究

教育學術發展與實務改進，有賴扎實深厚的教育研究投資，既需經費資源的挹注，更靠人力心智資本的發揮。就實而言，科技部所提供的學術研究資源與計畫獎補助申請管道並不少，若把握機會善加利用，提出好的研究構想，定能通過同儕審查獲得支持，藉以開展研究抱負，拓展學術版圖，實踐教育理念。

回顧二十餘年臺灣的教育發展，在追求教育品質與社會正義的努力下，教育改革政策與變革措施從未間歇，種種方案不斷推陳出新，不但帶來許多實務挑戰，也衍生出許多學理辯爭，因此理論與實務間的辯證對話、整合與轉化，便成為教育工作者責無旁貸的重要研究任務，必須透過教育學術社群的專業視野，進行深入地探討與前瞻性的擊劃，方能藉由研究來銜接理念與實務，引領政策制訂及實務的發展。長期以來，前國科會、現科技部對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資源挹注，確實鼓勵了許多學者投入各類教育議題的探索，不但教育研究人口大幅成長，研究計畫申請數量以及論文發表數量更是逐年提高，成果斐然。

然「量」的持續成長，並不保證「質」的普遍提升，也不盡然能夠促進實務的改進。身為教育學門召集人，為了解教育學門各級各類教育議題的研究趨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學系教授、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研究發展司教育學門召集人

勢，從中批判檢視教育學術研究發展問題與需求，於前年（2015 年）特別分析了 94 學年度至 103 學年度 10 年間科技部所補助的專題研究計畫，從歷年計畫數量的消長、採用的研究方法、探究的教育階段、關注的研究焦點、探討的教育議題等面向，評估教育學門各子學門的研究發展概況。分析發現，計畫申請數量確實呈現穩定成長，也有許多值得肯定的研究成果與學術累積，但各子學門研究計畫所探討的教育階段卻呈現分布不均的情形，而不同教育階段的研究焦點及對象也是相當的多元、比重各異，至於在議題選擇與方法取徑方面更呈現出明顯的偏廢與落差，仍有不少有待改進補強的研究缺失（詳見甄曉蘭、余穎麒，2016）。凡此，都需要教育研究社群更多批判反思、對話，積極爭取資源、集結人才（科技部與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都有許多相關補助方案），群策群力地提出更多前瞻、扎實的研究計畫，對重要的教育研究議題進行長期、系統的深究，整合出更為理想、永續的教育學術發展與實務實踐。

擺脫績效迷思與知識量產的偏差

近年來，由於國際評比的學術競爭壓力，以及高等教育評鑑制度與彈性薪資的推動，使得 SSCI、A&HCI 或 TSSCI 論文的發表數量統計，及所謂“Impact Factor”或引用率的點數計算，成為各界評鑑與獎勵學術表現的參考依據，但不知怎麼地，在莫名的評比迷思與急功近利的競逐氛圍中，“I”級期刊論文多寡與等級竟被誤導、炒作成為最主要的學術表現判準，大專院校學術發展單位爭相辦理論文寫作與期刊投稿策略工作坊，以衝高論文發表數量，提升學校學術績效與排名；許多（年輕）學者則在高等教育「蘿蔔與棒子」的獎懲策略下，面對限期升等、績效評量、差別薪資等種種壓力，也紛紛投入「速效」、「量產」的學術生產模式，熱衷於揣摩國外（美國）學界的熱門研究議題與寫作形式，投稿於易獲刊登的國外期刊，以便快速地提高個人學術產能與產量；而各式各樣趨利傾向的研究群、寫作圈、編譯社、甚或學術研討會組織更是應運而生，取巧地創造所謂的學術「業績」，並策略性地聚斂／鞏固所謂的學術「資本」。如此「反學術」、「反教育」的研究風氣與知識生產現象，怎不讓人唏噓、悲憤。

無可諱言地，在目前看似蓬勃發展卻不盡理想的研究生態背後，教育研究也充滿了學術價值定位的困惑，以及對研究品質與貢獻的質疑。許多研究忽略了對臺灣本土重要教育議題的關懷與深入探究，甚至漠視對學術知識生產、理論建構及實務改進的社會責任。誠如多年前在〈教育研究發展現況與省思〉一文中所檢討（甄曉蘭，2011，頁 51），在表面統計數字上，教育相關學術發表績效

彷彿是有所提升，但就學術研究的底蘊而言，實則並未真正改善研究品質、提升學術影響，許多曇花一現的學術發表，對臺灣整體教育學門學術知識的傳承累積，並沒有發揮太大的作用，若進一步從學術創新與長遠發展來看，則更是置教育學術研究於劣勢地位，不利教育研究的持續精進與學術的健全發展。

然感到欣慰的是，還是有許多學者不受周遭扭曲的學術評鑑與研究氛圍所影響，仍堅守研究風骨（research integrity）、捍衛學術良知與教育信念，為研究關懷及學術發展，孜孜不倦，長久耕耘，展現學者「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的風範。面對這些年來不當評鑑規準所造成的研究生態失衡與知識生產偏差現象，許多學界有識之士已紛紛提出批判反省與建言，不斷地懇切呼籲回到學術研究本質，踐行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而科技部與教育部也因層出不窮的學術倫理案件痛定思痛，已經開始審慎評估現行研究表現評量方式，並著手處理研究表現評量改善方案事宜，以期導正研究風氣，更多重視研究成果的品質、創見與貢獻，並鼓勵有利知識累積與實務應用的研究。當然，科技部帶頭改善研究表現評量方式，或有助於扭轉以量取勝的研究績效評鑑偏差，鼓勵學者進行大格局、具長遠影響的研究，然外部規範調整的效益仍然有限，教育學術研究風氣的改進與研究品質的提升，還是有賴教育學術社群（及研究者本身）的自覺、自律與自許，方能真正擺脫「績效」迷思，回歸教育信念與學術研究本質，善盡社會責任，戮力研究、發展學術、改進教育實務。

銜接學術研究與政策實務帶動教育革新

理論與實務不能截然二分，彼此間存在著相連互惠的辯證關係。教育研究與政策實務之間更是如此，必須透過批判的辯證思考來銜接彼此，以學術研究來開展實務視野，突破既有的教育思維與實踐方式，並藉由實務研究來充實理論內涵，激盪出有益於實務改進的教育論述。換言之，教育研究者不能只關心學界的興趣與評價，而不在乎實務界的需求，更不能只是玩些學術修辭遊戲（rhetoric games），高唱一些傲慢真理，完全與教育現場實務疏離無關。就這些年對教育研究的分析與觀察，發現教育研究領域確實有一些不盡理想的發展現象，或過度追隨研究風潮、擁抱流行語言、引介他國經驗；或淪於技術性的研究操作、重複調查／實驗老舊的議題；再不然就是不分緩急輕重做一些自得其樂的題目，輕忽了教育研究的優先順序與實務焦點，失落了教育研究的意義。許多研究成果或發表於國內外學術期刊，或分享於國內外學術研討會，卻鮮少與社會大眾對話，藉以激盪多元批評與實務迴響，當然也就無益於教育決策及

教育實務的改進。

教育研究範圍相當廣泛（從幼兒、小學、中等、高等教育，一路到成人社會教育、高齡終身教育；從特殊教育到多元文化教育；從認知心理到社會正義；從課程教學到師資培育等等），實用性格極強，必須要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結合、研究與政策及實務的銜接。換言之，教育研究即實踐（educational research as praxis），含涉了批判的反身行動實踐特質，透過行動導向的研究來產生「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才能彰顯教育研究的意義與價值。然遺憾的是，每年投資了許多經費補助教育研究計畫，但研究結果多半束諸高閣，其中甚至包括許多教育政策與教育改革攸關的報告。前些年反思教育研究與政策及實務關係時（甄曉蘭，2011），就已提醒，教育研究如果不能產生「有用的」知識、處理研究與政策／實務間的合理關係，必然會影響到社會大眾對教育研究的支持。

教育國之本！教育研究的推動，不僅要傳承過去、接軌現代，更需要著眼於未來，並與時代脈動及全球趨勢同步進展。基於教育本身即是一種道德與政治的實踐（education as a moral and political practice, Biesta, 2007，引自甄曉蘭，2011），教育研究者不能只是埋首於自身的研究與發表，講究研究技術與學術發表的精進，也要顧及所處政治環境脈絡中的文化角色，需要集結教育學術社群一起檢視研究和主要社會議題的相關性，探討如何強化研究發現的傳播與應用來改進教育政策與實務，並透過持續的民主辯證與審議機制，來拓展教育研究與政策及實務連結的互惠影響關係，帶動研究知會（research-informed）與證據本位（evidence-based）的教育決策與實務革新，積極發揮教育研究的社會影響。

發抒感言至此，謹以老子智慧語錄互勉之：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

修之於家，其德乃餘；

修之於鄉，其德乃長；

修之於國，其德乃豐；

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引自老子，道德經，第五十四章）

參考文獻

- 甄曉蘭、余穎麟（2016）。〈科技部教育學門研究趨勢檢視與省思：94-103 學年度專題計畫分析〉，《教育研究集刊》，第 62 輯第 2 期，頁 131-152。
- 甄曉蘭（2011）。〈教育研究發展現況的省思〉，《人文與社會科學簡訊》，12 卷 4 期，頁 49-55。